

从1925年10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广泛开展革命宣传,领导开展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不断巩固壮大党的力量,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中共豫陕区委的成立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发展河南省党组织。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央派王若飞、萧楚女等一批老同志领导河南省党的工作。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指出:河南“应当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整理各级党部的组织,并定出系统的计划来代替人的指导个人的活动”。

根据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要求,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成立,领导河南省、陕西省的关中地区(是年底,陕北地区也归豫陕区委领导)、江苏省的徐州、安徽省的宿县等地的党组织和革命活动,王若飞为书记,黄平万、李求实、李震瀛、彭泽湘等为委员。中共豫陕区委隶属中共中央领导,同时接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下辖3个地委,7个特别支部,10多个支部,党员200余人。

整顿发展党的组织

针对当时党的组织尚未健全、领导力量不强、部分党员团员思想水平低、缺乏斗争经验等实际情况,豫陕区委甫一成立,首先进行组织上的整顿和思想上的教育。在河南境内的地委和特支由区委派人前去改组,陕西境内和徐州则分别由特派员担任此项工作。与此同时,加紧内部训练,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增强组织观念。比如,开封以举办训练班为主要形式进行内部训练,区委书记王若飞、共青团豫陕区委书记李求实等任教员,或拟写报告提纲,或指定专人演讲,学习内容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之本质、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之组织、党的知识等。各支部除学习《中国青年》《向导》刊登的文章和《共产主义ABC》外,还开展关于个人和主义、团体与组织的讨论,对存在的旧思想、旧观念有针对性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豫陕区委在工运、农运、学运、军运和国民运动等方面的组织陆续建立,党的领导得到加强,党组织快速发展,党员的思想觉悟和党组织战斗力显著提高。到1926年1月,已建立起郑州、开封、信阳、西安等7个地委和彰德、洛阳、徐州等10个特别支部,党员达到700多人。

■ 拾遗 ■ 沈从文耐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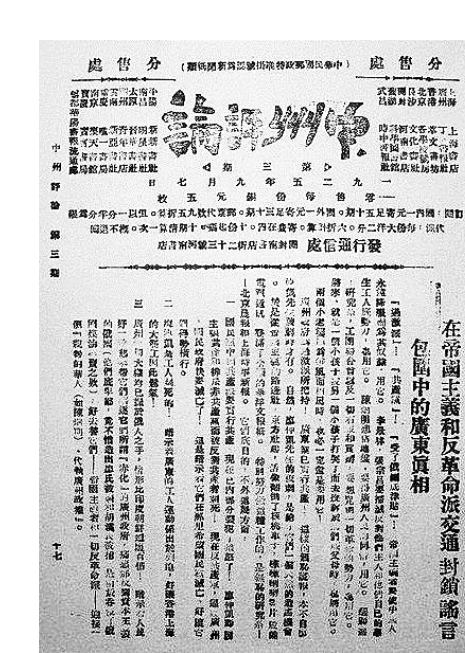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曾在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提到:“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做事时多了一点‘耐烦。’”而沈从文在《读创作》一文中也曾说过同样的话:“我不希望自己比别人聪明,只希望比别人勤快一些,耐烦一些。”正是在平日的教书时多了一些耐烦,又多了一份耐心,沈从文的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1938年11月,沈从文来到西南联大,开始担任中文系教授。当时,他在为学生上作文课时,发现一部分学生的作文写得不尽如人意,不是主题太过分散,便是语言贫乏、表达苍白。为了帮助学生尽快掌握写作的方法和要领,沈从文打算腾出半年的时间,专门为学生教授写作知识,同时他还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他要求全班学生每周必须上交一篇作文,长短不限。如果有哪位同学没有按时完成写作任务,待到下周时会加罚一篇,以此类推;除此之外,沈从文还针对大家作文中出现的问题,推荐学生阅读一些相关的中外文学名著。为此每天上课时,他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带给学生,让大家课后学习。另外,他家从早到晚都有学生前来借书,至于谁借了什么书、能否按时归还,沈从文从不在意,也从不计较。有一天甚至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保证,只要大家的写作水平能提高,就算把他家的书全部借完不还,他也心甘情愿。

当时有人不解地问沈从文:“平日教学工作本身就很繁忙,你为何还要不辞辛苦地为学生‘开小灶’,一点都不觉得麻烦吗?”沈从文严肃地回答:“为了提高学生的个人素养和文化知识,如果做事害怕耐烦,又缺少耐心,那哪成?”短短的一句话,令人对他的敬业精神敬佩不已。

（据《联谊报》）

中共豫陕区委的成立和发展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州评论》第三期。

中共豫陕区委自成立伊始,便非常重视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1925年9月1日,共产党员萧楚女创办的政治性刊物《中州评论》出版发行,这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在国内10多个省市设有17个代办处,主要刊登政治评论、国际政治和工运、农运、青运及妇女运动的情况,遇有重大事件还出专号、专刊或特刊。豫陕区委成立后,《中州评论》成为区委的机关刊物。《中州评论》旗帜鲜明,富有战斗性,公开声明自己的目的是“继承着五卅以来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精神,立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准备着去领导这个运动”。在宣传内容上,主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宣传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指出当时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最残酷的统治,必然要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组织凝聚青年力量

生为主,虽然规模小,但影响很大。为结成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广泛统一战线,中共豫陕区委决定将4个青年革命组织合并为河南青年协社。1925年12月底,河南青年协社召开成立大会,参加人员有4个团体的社员400多人。大会通过了协社宣言、总章、运动纲领,成立宣言指出:“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应该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同时为了民族

深入开展农民运动

“望各地有农协组织之地方,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立刻准备代表和搜集到会讨论材料,北伐路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其重要。”根据这一指示,豫陕区委在开封召开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大会确定了开展农运的方针政策,以各种农民自卫武装团体作为主要对象,使之成为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民自卫武装。此外,大会还决定对豫南和京汉、陇海铁路线上有着发展工作之需要和可能的18个县,着手开展农运工作。

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入豫后大肆镇压

宣传正确的革命道路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建立革命的民主政府,建立以工农为主体的各民主势力的联合战线;宣传坚持革命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指出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的武装。

1925年11月,针对河南省警察厅“禁止赤化宣传”和“悬赏稽查共产党机关”等行径,王若飞以“岳威”为笔名在《中州评论》发表《异哉,警察厅之所谓赤化》一文,针锋相对地指出:“只有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才会在共产主义的面前发抖啊!”《中州评论》对宣传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党早期的理论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区委领导的群众组织中也创办有多种革命刊物,较有影响的有《雷火》《青年评论》等。豫陕区委通过这些进步刊物,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方针政策。

的解放,我们更应该站到第一道战线去”“我们自己应该组织团结起来,为自身利益而奋斗;我们同时应该去唤醒工农组织团结起来,为全国同胞的利益而奋斗”。会后,社员很快发展到600多人,他们到工人农民中开展宣传教育,创办平民夜校、补习学校等,提高工人、农民的觉悟,壮大革命力量,青年协社成为豫陕区委开展反对军阀统治的有力群众组织。

压工农运动,使农民运动遭受巨大损失。针对这一情况,中共豫陕区委通过省农协向13个县派出农运特派员,他们多以乡村教师身份开展平民教育,对各地协进行整顿和训练,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到1926年5月底,全省农民协会已恢复4个县农民协会,32个区农民协会,200余个村农民协会,会员人数约27万,仅次于广东省,占全国协会会员总数的27.5%。

1926年8月,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需要,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豫陕区委,分别建立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据《人民政协报》）

长征路上的两条半截皮带



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的半截皮带。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收藏着两条见证红军长征过草地时艰苦岁月的半截皮带。其中一条来自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皮带一端曾被割断又重新磨出了尖头,背面烙着“长征记”3个字;另一条来自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半截黑乎乎的皮带上至今保留着用刀切割的痕迹。谁能想到,这两条不完整的皮带,在红军长征过草地时就是救命粮。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一段用来煮野菜,一段用来熬鲜汤。有汤有菜花样多,留下一段战友尝。”这首红军过草地时传唱的《牛皮腰带歌》,不仅体现了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还表现出红军官兵互相帮助、甘苦与共的革命情谊。

1936年7月,战士周广才随连队从四川甘孜出发第三次过草地。与前两次过草地不同,这次的路途更远,时间更长,而最大的考验还是粮食的严重短缺。

周广才所在班原有14人,到过草地时只剩7人。穿越草地还未过半就已断粮,他们只好寻找野菜、草根、树皮充饥。渐渐地,连半株野菜也难寻,他们只好从自己身上搜罗可以充饥的东西:先

是皮鞋带,然后是钉在鞋底上的皮撑,最后只剩下周广才的皮带。

周广才的皮带是1934年红军在任合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是他的心爱之物。为抵抗饥饿、挽救全班战友的生命,周广才主动将皮带贡献出来。看着皮带被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皮带丝,漂在稀溜溜的汤水里,周广才忍不住攥紧剩下的半截皮带,提议大家把全班最后一根皮带保存下来,带着它去见党中央、毛主席。就这样,大家怀着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将这吃剩的半截皮带保留了下来。

在随后的长征途中,周广才班里的6位战友相继牺牲,只有他随部队到达了延安。为缅怀牺牲的战友,周广才用烧红的铁筷子在皮带的背面烫上“长征记”3个字,并用红绸子包裹起来,小心翼翼地珍藏。1975年,周广才将自己珍藏了数十年的半截皮带捐赠出来,并亲笔写下了说明:“一九三四年在四川任合场战斗中缴获敌人的战利品,在长征过草地时断了粮食,最后将皮带吃掉了一节。”周广才与“半截皮带”的军史往事,至今仍记录在南部战区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4连的荣誉室里,红军将士同甘共苦、信念如铁的红色基因将一代代流传下去。



红四方面军战士周广才的半截皮带。

官兵同吃皮带的艰辛历史,印刻在红军将士的记忆里。时任红二方面军政委任弼时在过草地时,也曾与警卫员李少清一同吃过一条皮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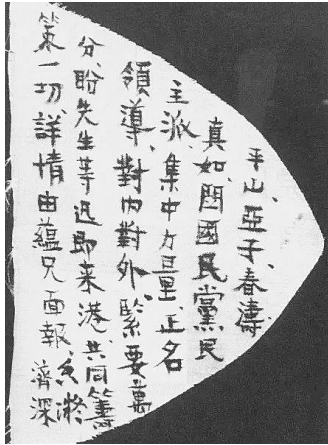
任弼时与贺龙等人率部长征过草地时,许多战士因为饥饿昏倒。在找不到替代食物的情况下,任弼时和李少清将皮带切成若干段,放到锅里煮。为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他们规定每人只能吃3小块。虽然味道难闻、难以下咽,但他们风趣地将其称为吃“煮牛肉”。吃剩下的半截皮带一直被任弼时精心保管。1938年,任弼时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时,将其交给李少清保存。解放后,李少清将其捐赠出来。

在漫长而艰苦的长征途中,每一次胜利与挫折都凝结着红军官兵生死相依、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在长征路上,红军官兵响亮地提出:“强帮弱,大帮小,走不动的扶着走,扶不起来的抬着走,不落一人,不掉一马!”有人走不动了,战友便把自己仅有的半块干粮递给他……正是凭借这种“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革命意志,红军成功走出草地,走向胜利。（据《中国国防报》）

■ 以物述史 ■

绸巾上的密信:

民革在香港成立始末



这一方绸巾上写有(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真如(陈铭枢)、蓝元(朱蕴山)、(何)香凝、(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派人士的名字。

朱蕴山早已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但在开船的前一天接到友人电报,被告知一到上海就有被逮捕的风险。为了绸巾上所列人员的安全,朱蕴山最终未能成行,改由其他人传递口信。

最后,这一方绸巾在柳亚子到港后由其当面接收并保存下来,成为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历史见证。

从1947年5月起,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港多次聚会,对联合组织的任务、政治纲领等进行了充分讨论。但在组织命名上,大家有不同意见。宋庆龄捎口信给何香凝提出建议:“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考虑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

很多成员不想和“国民党”三个字有关系,想要与国民党反动派划清界限。但何香凝坚持宋庆龄的提议。她认为,“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国民党民主派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留孙中山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有利于广泛号召”。而且,“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只有善于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我们这个组织才会兴旺发达,才能在与共产党真诚合作中发挥分化敌人的作用”。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正式举行。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历史性时刻,国民党各民主派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实现了大联合,使国民党反动势力更加陷于孤立,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后,民革同中国共产党在风雨同舟中成为了亲密的友党。（据统战新语）

■ 历史忆人 ■ 典故 “把一切献给党”

“把一切献给党”这句话,是老一辈革命家吴运铎自传的书名,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吴运铎,祖籍湖北汉阳(今武汉市蔡甸区),1917年生于江西萍乡,1938年参加新四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兵工事业的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他的自传《把一切献给党》鼓舞了一代代青年。

1942年,中国南方陆路补给线被日军掐断。为了保证前方战士们的军需,负责军工生产的吴运铎毅然承担起了制造武器的重任。由于找不到火药原料,只能用其他物品替代,吴运铎想办法把红头火柴上的磷刮下来,拿酒糟泡开,用来制火药。

在研制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中,吴运铎曾多次负伤,他的一条腿和四根手指被炸断,一只眼睛被炸瞎。在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守在一线。他陆续研制出枪榴弹、地雷、平射炮等武器,成了名副其实的“枪炮大王”。

负伤住院期间,吴运铎从淮南《抗敌报》一个同志那里借阅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保尔·柯察金的事迹和精神深深感动了他。当他能下地时,便请示领导买来化学药品和仪器,把病房变成实验室。后来,吴运铎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把自己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正如吴运铎在书中写的:“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

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指示相关部门给行动不便的吴运铎调拨一辆小轿车。工作人员选了一辆英国高级轿车,吴运铎却坚持换成一辆便宜车。有了公车之后,他也只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平日上下班都是挤公共汽车。他腿受过重伤,视力也很差,出行不方便,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自己却笑着说,坐不坐专车是个小事,丢了勤俭节约的老传统可是大事。

吴运铎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及家人。在孩子的教育上,他希望儿女们凭借自己的努力成长成才,不能躺在上一代的功劳簿上。儿子吴小勤17岁便离开北京,后来在山东安家、结婚、生子。吴运铎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关系将牵挂了几十年的小儿子调回北京,吴小勤也不曾向父亲提出过半点非分要求。

晚年的吴运铎,每当有人问起子女的情况,他总是一副欣慰的样子,“孩子们都争气”,这是他最大的安慰。吴运铎曾这样总结他的教育经验:“子女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们都是党的儿女,今后的路由他们自己闯。”

吴运铎在武汉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1955年春,吴运铎回到蔡甸老家,为当地小学师生作了一场报告,临行前将苏联赠给他个人的一部珍贵的收音机送给了当地政府。他常说,“把一切献给党不能只献一阵子,而要献一辈子”。

1991年5月2日,吴运铎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吴运铎一生为了党和国家的兵工事业舍生忘死、无私奉献,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以爱党爱国的赤子之心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勇气践行了“把一切献给党”的庄严承诺。正如他自己所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据《中国纪检监察报》）